

怀念敬爱的滕藤同志

○ 俞芷青（教）



习时留影
志在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学
一九五七年冬，滕藤同

我是1956年从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服从组织分配来到清华的。9月份到清华以后直接进到工程物理系，当时的系主任是何东昌同志，党总支书记是滕藤同志。

滕藤同志是第一个和我谈话的领导。他说清华要搞原子能化工，并明确地跟我讲：“我到各个地方去挑选人员到工物系来参加教学和科研工作，要找男同志，不想找女同志，因为原子能化工可能会影响女同志的生育问题。”当时我很吃惊，第一次跟我谈话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内容。我立刻表态说：“我们中国有7亿人，我们不缺任何人生育子女，只要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原子能工业，我愿意这一生不要后代。”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清华大学取消了原子能化工专业以后，我在38岁那年才生了一个女儿。第一次谈话的印象对我而言是极为深刻的，当时我是海淀区晚婚晚育的典型。

到了工物系以后，我跟滕藤同志的接触主要是前半段，因为在业务上分

工，我属于“110”专业。“110”是从原子能的矿物里面提取铀、钍稀有金属这样一个任务。“120”是人工放射的专业，“130”是同位素的专业，还有“140”高分子专业。这是当时工物系化工方面的主要结构，物理方面还有“210”“220”“230”“240”专业。

工物系的创建，滕藤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自己以身作则，不只是承担了领导的作用，而且亲自实现“双肩挑”。在1956年到1957年间，滕藤同志的主要工作是挑选人员到工物系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从天津大学选出了两位研究生同志，分别是蒋维钧和李以圭，还有我这个本科生；从大连工学院又选了三位本科生同志，分别是潘国昌、秦建侯和黄兰芳。就是这么几个人，共同组成了原子能化工小组，组长是朱永贻同志。朱永贻同志因身体原因今天不能来参加追思会，现在健在的有潘国昌和黄兰芳，其他的同事都已离世，他们都为我们工物系和工化系的建设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1957年，滕藤同志自己带队到苏联学习，当时主要面对的是两个学校，一个是门捷列夫化工学院，一个是列宁格勒化工学院。滕藤同志和秦建侯同志去了列宁格勒化工学院，后来在列宁格勒学习过的还有周其庠同志。周其庠研究生毕业以后就调到了我们工物系来。滕藤同志在1957年留苏学习的时候，调研各个国家各个方面的科研状况。他的才思非常敏捷，记忆

力又很强，所以他了解到的各种信息是非常丰富的，他总能及时跟进国际的先进水平，并且加以改进。举例来说，我们完成的很著名的“712任务”，它的原始思想，滕藤同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滕藤同志跟汪家鼎先生一起组织完成了“712任务”。我们系里很多同志都参与了“712”的工作，为国家的原子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712任务”最主要的贡献就是研制出了提取钚、铀等核燃料后处理的工艺技术路线。苏联当时做的是沉淀法提取钚和铀，滕藤同志在充分调研以后，非常明确地提出：“沉淀法不如萃取法，萃取法的效率要高得多。”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712任务”有了很大的进展，所以说滕藤同志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在整个业务上也是领导推动了我们工物系的发展。

后来，学校成立了工化系，工化系的成立滕藤同志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首先通过中央组织部，1957年从天津大学调来了汪家鼎先生，工化系成立后，汪先生担任系主任，后来在70年代又从外地调来了黄圣伦同志等担任系领导，加强了整个化工系的领导班子建设，为系里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我跟滕藤同志接触比较早，尤其是在留苏的时候，因为我们住的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的宿舍是作为外地留学生到莫斯科来暂住的地方。我们刚到苏联的时候，全体都住在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的宿舍里面。滕藤同志不仅从事政治和业务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同时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兴趣爱好，他非常热爱古典音乐。到了莫斯科以后，他带着我和秦建侯在莫斯科大街上参观游玩，记得当时滕藤同志在大街上随兴就哼

起了交响曲或者歌剧，我也很喜欢音乐的。因此，走在路上他就考我说：“你唱第一句，我立刻就能给你接上第二句。”果然，不管是歌剧、芭蕾舞曲还是交响曲，只要我哼出一个片段，他立刻就可以跟上来全部。我真没有想到滕藤同志这么多才多艺。

滕藤同志和我们在一起就像同学和朋友一样，我们真没想到自己的领导是这么平易近人。举个小例子，莫斯科的大街上满都是卖冰淇淋的摊位，滕藤同志就说我们一人买一个，我们每人就都买了一个，等每人吃了一口两口，他说：“行了该换了。”然后他就把他的冰雪糕递给我，然后把我的拿过去吃。青年时代和滕藤同志留苏期间度过的美好时光，至今记忆深刻难以忘怀。

滕藤同志不只是平易近人，兴趣爱好广泛，他在任何地方都是团结群众的中心。你只要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非常



1957年，工程物理系放射化工组部分成员合影。左起，前排蹲者：廖史书、朱永贻、秦建侯、李文才，后排站者：蒋维钧、黄兰芳、滕藤、俞芷青、许慧卿

□ 怀念师友

有智慧，非常有吸引力的。他走到哪里，周围群众很自然而然地都被他吸引在了身边。这一点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不论在任何的岗位，任何的工作地点都要团结群众，关心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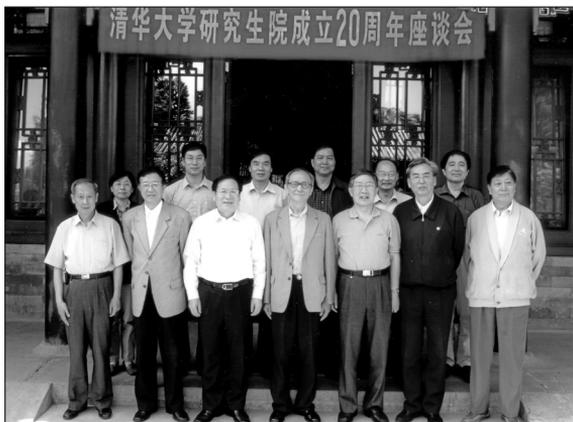
我非常感激滕藤同志对我个人的关心和保护。我的父亲当年被定为“极右分子”，这时我已经到了苏联。大使馆的人就找我谈话，说你学的是原子能化工，从铀矿里面提取各种需要的物质，你不能再学这样的保密专业，要我立刻打铺盖回国。这对我的打击是极大的，后来我想到，我应该有组织纪律性，于是我立刻跟滕藤同志联系汇报了情况。滕藤同志当时是在列宁格勒，他立刻向大使馆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把俞芷青放在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学习这个专业，因为我们清华大学办了工物系，是要按期开课的，可是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所有的资料都没有，都要从门捷列夫化工学院搬回来。如果把俞芷青的学习给停掉了，让她回国，那么谁来接替？因为办理留苏的手续需要很长的时

间，是不可能来得及开课的，因此大使馆第二次找我谈话，让我把专业名称改成“稀有金属工艺学”，也就是把“铀的工艺学”改成“稀有金属的工艺学”，我们懂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一码事儿。

这就是滕藤同志的智慧，他总是能创造性地解决一些难题。这样我就在苏联完成了把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整盘的东西都搬回来的任务，然后买了18箱各种各样的期刊、各种各样的材料，最后都海运到北京了。因此，我们工化系就有了一个资料室，可以供大家查阅所需要的材料。所以说在筹建工化系方面，滕藤同志同样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是这样才保留了学籍，保留了在那儿进修的机会。1959年9月我返回北京，9月底立即就开课了，我开了铀、钍，还有稀有金属提取方面的课程。当时我只有25岁，如果没有滕藤同志这样一个有开阔思想的领导，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大家也知道，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25岁的小助教是不可能上台讲课的。有这样的放心大胆鼓励年轻人成长的领导，我们就敢往上冲。

因此从25岁开始，我就担任了我们工化系的稀有金属工艺学和铀、钍工艺学讲课的任务，后来又参加了其他的一些科研工作，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1973年金涌同志到了清华以后，我才转方向跟金涌同志合作，做了很多反应器等流态化方面的工作。

今天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回忆和追思我们敬爱的滕藤同志，我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来认识和了解滕藤同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怀念敬爱的滕藤同志！



2004年，滕藤（前排中）作为清华大学首任研究生院院长参加研究生院成立20周年座谈会，前排左3为校长顾秉林，左5为原校党委书记方惠坚